

# 魏 晋 玄 学 论 稿

汤 用 彤 撰



## 读《人物志》

刘邵《人物志》三卷十二篇 隋唐志均列入名家。凉刘昞为之注。唐刘知几《史通·自序篇》及《李卫公集·穷愁志》均有称述。此外罕有论及者。宋阮逸序惜其由魏至宋，历数百载，鲜有知者。然阮乃云得书于史部，则实不知本为魏晋形名家言。其真相晦已久矣。按汉魏之际，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当时人著述，存者甚渺。吾人读此书，于当世思想之内容，学问之变迁，颇可知其崖略，亦可贵矣。兹分三段述所见，一述书大义 二叙变迁 三明四家 名法儒道）

—

书中大义可注意者有八。

一日品人物则由形所显观心所蕴。人物之本出于情性。情性之理玄而难察。然人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 就可即而求之。故识鉴人伦 相其外而知其中 察其章以推其微。就人之形容声色情味而知其才性。才性有中庸 有偏至 有依似 各有名目。故形质异而才性不同 因才性之不同，而名目亦殊。此根本为形名之辨也。汉代选士首为

察举 魏因之而以九品官人 )察举则重识鉴。刘邵之书 集当世识鉴之术。论形容则尚骨法。昔王充既论性命之原，遭遇之理(《论衡》第一至第十)继说骨相(第十一)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其原理与刘邵所据者同也。论声则原于气禀。气合成声，声应律吕。故整饰音辞，出言如流，宫商朱紫发言成句，乃清谈名士所尚。论色则诚于中形于外。诚仁则色温柔，诚勇则色矜奋，诚智则色明达。此与形容音声，均由外章以辨其情性，本形名家之原理也。论情味则谓风操，风格，风韵。此谓为精神之征。汉魏论人，最重神味。曰神姿高彻 神理隽彻 神矜可爱 神锋太隲 精神渊箸。神之征显于目(邵曰：“征神见貌 情发于目”)蒋济作论谓观其眸子可以知人。甄别人物，论神最难。论形容，卫玠少有璧人之目，自为有目者所共赏。论神情，黄叔度汪汪如千顷之陂，自非巨眼不能识。故蒋济论眸子，而申明言不尽意之旨。盖谓眸子传神 其理微妙 可以意得 而不可以言宣也。《抱朴子》曰：“料之无惑 望形得神 圣者其将病诸。”《人物志》曰：“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二语均有鉴于神鉴之难也。

二曰分别才性而详其所宜。凡人禀气生，性分各殊。自非圣人，材能有偏。就其禀分各有名目(此即形名)。陈群立九品 评人高下 各为辈目。傅玄品才有九。《人物志》言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师氏之任也。有法家，司寇之任也。有术家，三孤之任也。有国体，三公之任也。有器能，冢宰之任也。有臧否，师氏之佐也。有智意，冢宰之佐也。有伎俩，司空之佐也。有儒学，安民之任也。有文章，国史之任也。有辩给，行人之任也。有雄杰(骁雄)将帅之任也。夫圣王体天设位 序列官司 各有攸宜 谓之名分。人材禀体不同 所能

亦异 则有名目。以名目之所宜 应名分(名位)之所需。合则名正,失则名乖。傅玄曰,位之不建,名理废也。此谓名分失序也。刘邵曰:“夫名非实用之不效。”此谓名目滥杂也。圣人设官分职 位人以材 则能运用名教。袁弘著《后汉纪》叙名教之本。其言有曰:“至治贵万物得所而不失其情。”圣人故作为名教,以平章天下。盖适性任官,治道之本。欲求其适宜 乃不能不辨大小与同异。《抱朴子·备阙篇》云:“能调和阴阳者,未必能兼百行,修简书也。能敷五迈九者,未必能全小洁 经曲碎也。”蔡邕《荐赵让书》曰:“大器之于小用 固有所不宜。”皆辨小大 与《人物志·材能篇》所论者同(持义则异) 当世之题目人物者,如曰庞士元非百里才,此言才大用小之不宜也。《昌言》云:“以同异为善恶。”《抱朴子》云:“校同异以备虚饰。”《人物志》曰:“能出于材 材不同量 材能既殊 任政亦异。”曰能识同体之善 而或失异量之美。曰取同体也 则接论而相得。取异体也,虽历久而不知。皆论知人与同异之关系也(参看《论衡·答佞篇》贤佞同异)

三曰验之行为以正其名目。夫名生于形须符其实。察人者须依其形实以检其名目。汉晋之际,固重形检,而名检行检之名亦常见。《老子》王弼注曰:“圣人不立形名以检于物。”夏侯玄《时事议》云:“互相形检 孰能相失。”《论衡·定贤篇》云:“世人之检。”傅玄曰:“圣人至明 不能一检而治百姓。”皆谓验其名实也(检本常作验)。刘邵有见于相人之难,形容动作均有伪似。故必检之行为,久而得之。如言曰:“必待居止然后识之。故居视其所安 达视其所奉 富视其所与 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 然后乃能知贤否。此又已试 非始相也。”(刘注云:“试而知之 岂相也哉?”)《人物志》八观之说 均验其所为

而刘邵主都官考课之议 作七十二条及《说略》一篇 则《人物志》之辅翼也。

四曰重人伦则尚谈论。夫依言知人，世之共信。《人物志》曰：“夫国体之人 兼有三材 故谈不三日 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然依言知人 岂易也哉。世故多巧言乱德 似是而非者。徐幹《中论·核辨篇》评世之利口者 能屈人之口 而不能服人之心。《人物志·材理篇》谓辩有理胜，有辞胜。盖自以察举以取士，士人进身之途径端在言行，而以言显者尤易。故天下趋于谈辩。论辩以立异，动听取宠，亦犹行事以异操蕲求人知（《后汉书》袁奉高不修异操 而致名当世。则知当世修异操以要声誉者多也）。故识鉴人伦 不可不留意论难之名实相符 徐幹云：“俗士闻辩之名 不知辩之实”）刘邵志人物 而作《材理》之篇 谓建事立义 须理而定 然理多品而人异 定之实难。因是一方须明言辞与义理之关系，而后识鉴，乃有准则。故刘邵陈述论难，而名其篇曰材理也（按夏侯惠称美邵之清谈 则邵亦善于此道）

五曰察人物常失于奇尤。形名之学在校核名实，依实立名因以取士。然奇尤之人，则实质难知。汉代于取常士则由察举，进特出则由征辟。其甄别人物分二类。王充《论衡》于常士则称为知材 于特出则号为超奇。蒋济《万机论》谓守成则考功案第，定社稷则拔奇取异。均谓人才有常奇之分也。刘邵立论谓有二尤。尤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反。前者实为超奇，后者只系常人。超奇者以内蕴不易测，常人以外异而误别。拔取奇尤，本可越序。但天下内有超奇之实者本少，外冒超奇之名者极多。故取士，

与其越序 不如顺次。越序征辟则失之多 顺次察举则其失较少。依刘邵之意 品藻之术盖以常士为准 而不可用于超奇之人也。然世之论者 恒因观人有谬 名实多乖 而疑因名选士之不可用。如魏明帝曰：“选举莫取有名 名如画地作饼 不可啖也。”吏部尚书卢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 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 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 但须有以验其后。今考绩之法废 故真伪混杂。”明帝纳其言。诏作考课法。卢毓、刘邵同属名家。毓谓选举可得常士，难识异人。循名案常，吏部之职。综核名实 当行考绩。其意与刘邵全同也。

六曰致太平必赖圣人。刘邵曰：“情性之理甚微而玄 非圣人之察 其孰能究之哉！”夫品题人物基于才性 圣人之察，乃能究其理 而甄拔乃可望名实之相符。邵又曰：“主道得而臣道序 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盖天地设位 圣人成能。人主设官分职 任选材能 各当其宜 则可以成天功。是则 人君配天 正名分为王者之大柄。诚能以人物名实之相符 应官司名分之差别，而天下太平。然则太平之治，固非圣王则莫能致也。魏世钟繇、王粲著论云：“非圣人不能致太平。”司马朗以为伊颜之徒 虽非圣人 使得数世相承 太平可致。按刘邵曰：“众人之明 能知辈士之数 而不能知第目之度。辈士之明 能知第目之度，不能识出尤之良也。出尤之人，能知圣人之教，不能究之入室之奥也。”夫圣人尤中之尤 天下众辈多而奇尤少。甄别才性 自只可以得常士。超奇之人 已不可识 而况欲得圣人乎。圣人不可识，得之又或不在其位。则胡能克明俊德 品物咸宜 而致治平欤。依刘邵所信之理推之 则钟王之论为是 而司马朗之说为非也。

七曰创大业则尚英雄。英雄者 汉魏间月旦人 物所有名目之一也。天下大乱 拨乱反正则需英雄。汉末豪 俊并起，群雄 平定天下 均以英雄自许 故王粲著有《汉末英雄传》。当时四 方鼎沸 亟须定乱 故曹操曰：“方今收英雄时也。”夫 拨乱 端仗 英雄 故许子将目曹操曰：“子清平之奸贼 乱世之英雄也。”（此 引《后汉书》）而孟德为之大悦。盖素以创业自任也。又天下豪 俊既均以英雄自许 然皆实不当名。故曹操谓刘备曰：“天下英 雄惟使君与操耳。”而玄德闻之大惊。盖英雄可以创业 正中操 贼之忌也。刘邵《人物志》论英雄 著有专篇 亦正为其时流行 之讨论。其所举之例为汉高祖 所谓能成大业者也。志曰：“聪 明秀出谓之英 胆力过人谓之雄。”英雄者 阴胆兼备 文武茂 异。若胆多则目为雄，韩信是也。明多则目为英，张良是也 此偏至之材 人臣之任也 傅巽目庞统为半英雄 亦当系谓其偏 至 若一人兼有英雄 则能长世 高祖项羽是也。然成大业者 尤须明多于胆 高祖是也 参看嵇康《明胆论》 按汉魏之际， 在社会中据有位势者有二。一为名士，蔡邕、王粲、夏侯玄、何 晏等是也。一为英雄 刘备、曹操等是矣。魏初名士尚多具名 法之精神 其后乃多趋于道德虚无。汉魏中英雄犹有正人 否 则亦具文武兼备有豪气。其后亦流为司马懿辈，专运阴谋 狼 顾狗偷 品格更下。则英雄抑亦仅为虚名矣。

八曰美君德则主中庸无为。此说中糅合儒道之言，但于 后述之。

## 二

汉末晋初，学术前后不同。此可就《人物志》推论之。本

段因论汉晋之际学术之变迁。

《隋志》名家类著录之书除先秦古籍二种共三卷外有：

《士操》一卷 魏文帝撰；

《人物志》三卷 刘邵撰。

此二书之人名家，当沿晋代目录之旧。其梁代目录所著录入名家者，《隋志》称有下列诸种：

《刑声论》一卷（撰者不明）；

《士纬新书》十卷 姚信撰；

《姚氏新书》二卷 与《士纬》相似 当亦姚信撰；

《九州人士论》一卷 魏司空卢毓撰；

《通古人论》一卷（撰者不明）

以上共九种二十二卷 与《广弘明集》所载梁阮孝绪《七录》名家类著录者相合（惟卷数二十三当有误字）。然则刘邵书之人名家 至少在梁代即然。《刑声论》者 疑即形声 言就形声以甄别人物也。其余诸书，从其名观之，亦不出识鉴人伦之作。至若姚信 乃吴选部尚书 而《士纬》现存佚文 如论及人性物性 称有清高之士 平议之士 品评孟子、延陵、扬雄、马援、陈仲举、李元礼、孔文举 则固品题人物之作也。《意林》引有一条曰：“孔文举金性太多 木性不足 背阴向阳 雄倬孤立。”其说极似《人物志·九征篇》所载。然则魏晋名家与先秦惠施、公孙龙实有不同。

名学有关治道伦常 先秦已有其说 兹不具论。《汉书·艺文志》论名家而谓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名学已视为研究名位名分之理。《隋志》云 名者所以正百物 叙尊卑，列贵贱，各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其说仍袭《汉志》。然控名责实 已摄有量材授官 识鉴之理亦在其中 晋袁

弘《后汉纪》论名家亦相同)《人物志》、《士纬新书》之列为名家 自不足异也。

现存尹文子非先秦旧籍，或即汉末形名说流行时所伪托之书（兹已不可考）。其中所论要与汉晋间之政论名理相合（《隋志》名家有尹文而无公孙龙、惠施）据其所论 以循名责实为骨干。如曰：“名以检形 形以定名 名以定事 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 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王伯厚《汉志考证》名家下曾略引此段 检形定名 为名家学说之中心理论。故名家之学 称为形名学 亦作刑名学）

溯自汉代取士大别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渠。朝廷以名为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竞以名行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 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一方由此而士人重操行，洁身自好，而名教乃可以鼓舞风气，奖励名节。一方清议势盛，因特重交游，同类翕集而蚁附，计士频蹴而胁从（崔寔语）。党人之祸由是而起。历时既久，流弊遂生。辗转提携，互相揄扬。厉行者不必知名，诈伪者得播令誉。后汉晋文经、黄子艾恃其才智，炫耀上京。声价已定，征辟不就。士大夫坐门问疾，犹不得见。随其臧否，以为予夺。后因符融、李膺之非议，而名渐衰 惭叹逃去。黄晋二人本轻薄子 而得致高名 并一时操品题人物之权 则知东汉士人 名实未必相符也。及至汉末 名器尤滥。《抱朴子·名实篇》曰：“汉末之世 灵献之时 品藻乖滥 英逸穷滞 鬻鬻得志 名不实 贾不本物 以其通者为贤 塞者为愚。”《审举篇》亦言及此）天下人士痛名实之不讲，而形名之义见重，汉魏间名法家

言遂见流行。

汉末政论家首称崔寔、仲长统。崔寔综核名实，号称法家。其《政论》亦称贤佞难别，是非倒置。并谓世人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决。仲长统作《乐志论》立身行己服膺老庄。然《昌言》曰：“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王符《潜夫论》主张考绩，谓为太平之基。文有曰：“有号则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非人。”徐幹《中论》曰：“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仲尼之所以贵者，名实之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刘廙《政论·正名篇》曰：“名不正则其事错矣。”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实。”行不美则名不得称，称必实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实无不称于名，名无不当于实。”据此诸言，可征形名、名形之辨，为学术界所甚注意之问题。

《人物志》者，为汉代品鉴风气之结果。其所采观人之法，所分人物名目，所论问题，必均有所本。惜今不可详考。惟其书宗旨，要以名实为归。凡束名实者，可称为名家言也。（《后汉书·仲长统传》注曰：“名实，名家也。”）《材能篇》曰：“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也。”盖名必当实，若非实事，则非名也。《效难篇》曰：“名犹（疑由字）口进，而实从事退。”又曰：“名由众退，而实从事章。”（此二语似系引当时常用语，前者名胜于实，众口吹嘘，然考之事功，则其名败。后者实超于名，众所轻视，然按之事功，则真相显。二者均月旦人物普通之过失也。夫邵既注意名实，察人自重考绩，故作都官考课之法。其上疏有曰：“百官考课，王政之大较。”且核名实者，常长于法制。邵作有《法论》（《隋志》

入法家)又受诏作新律十八篇 著《律略论》。按魏律以刑名为首篇,盖亦深察名实之表现也。

王者通天地之性 体万物之情 作为名教。建伦常 设百官 是谓名分。察人物彰其用 始于名目。以名教治天下 于是制定礼法以移风俗。礼者国家之名器(刘邵劝魏明帝制礼作乐)法者亦须本于综核名实之精神。凡此皆汉晋间流行之学说,以名实或名形一观念为中心。其说虽涉入儒名法三家,而且不离政治人事 然常称为形名家言。至于纯粹之名学 则所罕见。然名学既见重,故亦兼有述作。魏晋间爰俞辩于论议 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其后乃有鲁胜注墨辩 为刑(依孙校作形)名二篇。爰俞之言今不可知。鲁胜则仍袭汉魏名家之义。其叙曰:“名者所以别同异 明是非 道义之门 政化之准绳也。”又曰:“取辩于一物 而原极天下之污隆 名之至也。”又自谓采诸众集为刑 形 名二篇 略解指归云云。如其所采亦有魏晋形名之说,则是书指归,必兼及于政治人事也。

魏晋清谈 学凡数变。应詹上疏 称正始与元康、永嘉之风不同。戴逵作论 谓竹林与元康之狂放有别。依史观之 有正始名士(老学较盛)元康名士(庄学最盛)东晋名士(佛学较盛)之别。而正始如以王何为代表 则魏初之名士 固亦与正始有异也。魏初,一方承东都之习尚 而好正名分 评人物。一方因魏帝之好法术 注重典制 精刑律。盖均以综核名实为归。名士所究心者为政治人伦。著书关于朝廷社会之实事,或尚论往昔之政事人物 以为今日之龟鉴 其中不无原理。然纯粹高谈性理及抽象原则者 绝不可见。刘邵之论性情 比之于宋明诸儒 论形名 较之惠施公孙龙之书 趣旨大别。后世称魏晋风气概为清谈玄学。而论清谈者,多引干宝《晋论》。

如曰：“谈者以虚薄为辩 而贱名检。”然魏曹羲、何晏、邓飏之党与也。其《至公论》曰：“谈论者以当实为清。则谈并不主虚薄也。又曹羲之言，乃论清议臧否，而魏初论人物者固亦甚贵名检也（当实为清 本循名责实之意）”

魏初清谈 上接汉代之清议 其性质相差不远。其后乃演变而为玄学之清谈。此其原因有二：（一）正始以后之学术兼接汉代道家 非道教或道术 之绪 由严遵、扬雄、桓谭、王充、蔡邕以至于王弼（老子之学影响逐渐显著 即《人物志》已采取道家之旨 下详 二）谈论既久 由具体人事以至抽象玄理，乃学问演进之必然趋势。汉代清议，非议朝政，月旦当时人物。而魏初乃于论实事时 且绎寻其原理。如《人物志》虽非纯论原理之书 故非纯名学）然已是取汉代识鉴之事 而总论其理则也。因其亦总论理则，故可称为形名家言。汉代琐碎之言论已进而几为专门之学矣。而同时因其所讨论题材原理与更抽象之原理有关，乃不得不谈玄理。所谓更抽象者，玄远而更不近人事也。

上项转变 可征诸于《人物志》一书。其可陈述者凡二点：（甲）刘邵论君德 本道家言。人君配天 自可进而对于天道加以发挥。此项趋势最显于王弼之书，待后论之。（乙）《人物志》以情性为根本，而只论情性之用。因此自须进而对于人性本身加以探讨 才性之辩是矣 按魏中正品状 品美其性 状显其才。故当时不论性情而辩才性。此盖与实际政治有关）。才性论者，魏有傅嘏、李丰、钟会、王广。嘏与会均精于识鉴（嘏评夏侯玄、何晏等事 见《魏志》本传注及《世说》。会相许允子事 见《魏志·夏侯玄传》注），李丰曾与卢毓论才性（丰主才性异 见《魏志·毓传》），毓本好论人物 作《九州人物

论》。而丰亦称能识别人物（《魏志·夏侯玄传》注）盖皆是与刘邵同类人物也（王广待详）按何邵《荀粲别传》（《魏志·荀彧传》注及《世说》注云：

太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

《世说·文学篇》云：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

注引《傅子》曰：

嘏既达治好正，而有清理识要。如论才性，原本精微。

合观上文 嘏所善谈者名理。而才性即名理也。虚胜者，谓不关具体实事，而注重抽象原理。注故称其所谈，原本精微也。至若玄远 乃为老庄之学 更不近于政事实际 则正始以后 谈者主要之学问也。又《世说·德行篇》注引李秉（原作康 误）《家诫》言司马文王云：

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 而未尝评论时事 臧否人物。

按自东汉党祸以还，曹氏与司马历世猜忌，名士少有全者。士大夫惧祸，乃不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此则由汉至晋，谈者由具体事实至抽象原理，由切近人事至玄远理则，亦时势所造成也。

综上所述 正始前后学风不同 谈论殊异。《人物志》为正始前学风之代表作品，故可贵也。其后一方因学理之自然演进，一方因时势所促成，遂趋于虚无玄远之途，而鄙薄人事。

《世说·言语篇》曰：

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 时有入心处 便觉咫尺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

魏初名士谈论，均与政治人事有关，亦金华殿语也。东晋名士听讲《礼记》虽觉人心而叹其未关至极。则风尚之已大有变迁，盖可窥矣。

### 三

《人物志》一书之价值如何，兹姑不论。但魏初学术杂取儒名法道诸家，读此书颇可见其大概。故甚具历史上之价值，兹略述于下。

汉魏名家亦曰形名家，其所谈论者为名理。王符《潜夫论》曰：有号则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废人。此谓典制有号，相称则官无废职，人物有名，见效则位无废人。然则名理乃甄察人物之理也。傅玄曰：“国典之坠，犹位丧也。位之不建，名理废也。”据此，则设位建官亦谓之名理。荀彧善谈名理，据《世说》注，似其所善谈者才性之理也，此皆名理一辞之旧义。后人于魏晋玄学家均谓长于名理，失其原义矣。按名家以检形定名为宗而推之于制度人事，儒家本有正名之义，论名教者必宪章周孔，故《人物志》自以为乃依圣人之训。其序曰：

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民之论，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性慤而无信以明为，应作依，名见《九征篇》。依《全三国文》据宋本作伪，似之难保。

刘邵叙列人物首为圣人，有中庸至德。次为兼材，以德为目（伊尹、吕望又如颜子），次为偏至之材，自名。此乃三度，谓

出于仲尼之三等也。此外则抗者过之，拘者不逮，谓出于孔子所言之狂狷。至若乱德之人，一至一违，称为依似，则是孔子所斥恹恹无信之人。刘邵分别品目，大较不出于此，均自谓本于儒教也。书中引儒义尚多，兹不赘。应詹上疏谓元康时乃以玄虚弘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正始之间则不然，盖魏世名分礼法本为时尚，读者并为儒书，家教犹具典型。即阮嵇放达亦似有疾而为非以乱道。戴逵《放达为非道论》。晋兴以后则不然矣。

名法二家均言循名责实，其关系尤密，此可于刘邵、卢毓二人见之。刘作《人物志》，卢作《九州人士论》，同主依名选士，考课核实。毓与邵同定律，于刑律均有著述。毓所举之名人有阮武，武亦为法家，亦能知人，比为郭林宗。其所作《政论》言弩有法准，故易为善，明主张法于天下以制强梁之人。其告杜恕依才性能用为言，则亦兼名法家言也。又建立纲常，尊卑有序，设官分职，位人以材，本儒教正名制礼之义。然《韩非子》曰：“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此人主之所执。”则名分卑尊择人任官，在儒家为教化，而在法家则为主术。教化所以导善，主术乃以防奸。魏晋相继，篡逆叠起，权臣执柄，君臣危之，则不得不申尊卑之防。篡杀既成，窃国者自危，尤不得不再申正名之义。曹魏父子严刑峻法，司马父子奖挹忠孝，其迹虽殊，用意则一。故不但儒名二家相通，而其实则常实为法术之运用也。又考课之法原载儒书，然其意固在综核名实，则又法家之言。故论者多讥其专在于止奸，而失于立本。故卢毓、刘邵立考课之法，而傅嘏上疏有曰：“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杜恕奏有曰：“世有乱人无乱法，若使法可任，则

唐虞不须稷契之佐 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又曰：“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竟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据此则考绩托言源出圣王之治，而实阴取申韩之术也。按傅嘏论才性出于名家 杜恕作《体论》乃儒家言（《隋志》）殊少法家趣味。刘邵重考课，修刑律，其学虽合儒名，而法家之精神亦甚显著也。

魏文帝重法术，明帝奖经术，形名家言通于二家亦甚流行于世。然其时道家之学亦渐盛，终成正始玄风。故正始以前名士中颇兼老氏学而可称为过渡之人物。夏侯玄少知名，士大夫中声望极重。荀粲好道家言，赞泰初为一时之杰。何晏喜玄理，谓其深而能通天下之志。玄亦复崇奉自然，在魏代玄学家泰初之地位颇高，而时亦较早。然玄亦以知人见称于世，为中护军拔用武官无非俊杰（以此为司马氏所忌）。书议时事 评九品中正 陈建官之意 最中时弊。其论古无肉刑 与李胜往复，则知亦留心于法意。故夏侯泰初者上接太和中名法之绪 下开正始玄理之风也。钟会少尝受《易》与《老子》反复诵习 曾论《易》无互体 与王弼之意相同 史亦称其与辅嗣并知名，则会固擅长玄学。会又长于识鉴，善论才性，集傅嘏等之说而为《四本论》 此论在魏晋甚流行 故史又称会精练名理也。《魏志》本传曰：“及会死后 于会家得书二十篇 名为《道论》 而实刑 应作形 名家也。其文似会。”夫论以道名而内容为形名 其故何在 颇堪探索。

今本《尹文子》序曰：“其学本于黄老 大较刑 形 名家也。”高似孙《子略》论 亦言其杂取道家。《四库提要》云：“其书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陈治道欲自处于虚静，而万事万物则一一综核其实。故其言出入于黄老申韩之间。”魏代名家本采纳